

○ 国家图书馆

编

# 部级领导干部

BUJILINGDAOGANBU

# 历史文化讲座

LISHIWENHUAJIANGZUO

•2012•

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
◎ 国家图书馆 编

BUJILINGDAOGANBU  
部級領導干部

LISHIWENHUAJIANGZUO

12·  
历史文化讲座

■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· 2012 / 国家图书馆编. —北京：  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. 4

ISBN 978 - 7 - 5013 - 4991 - 3

I . ①部… II . ①国… III . ①社会科学 - 干部教育 - 教材  
IV . ①1C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4056 号

责任编辑：郭又陵 初小荣

书名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· 2012

著者 国家图书馆 编

---

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  
(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)

发行 010-66114536, 66126153, 66151313, 66175620  
66121706 (传真), 66126156 (门市部)

E-mail btsfxb@ nlc. gov. cn (邮购)

Website www. nlcpress. com → 投稿中心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

印张 9

---

开本 880 × 1230 (毫米) 1/32

字数 200 千字

印数 1—3000 册

版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013 - 4991 - 3

定价 30.00 元

# 目 录

- 邓小南 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 / 1
- 钱铭怡 心理健康与心理问题的应对与干预 / 19
- 叶嘉莹 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与吟诵 / 51
- 王 巍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 / 71
- 李绍先 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前因后果 / 113
- 田 青 禅与乐——中国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/ 135
- 王子今 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 / 153
- 王志远 《般若三经》概说 / 179
- 吴宗国 说不尽的盛唐 / 209
- 颜炳罡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/ 231
- 钱乘旦 延续与变异——英国当代政治制度解析 / 261

邓小南

# 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

邓小南，女，1950年生。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。现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，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。

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与研究生教学工作，先后主持多项中华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。曾在哈佛大学、牛津大学、耶鲁大学、东京大学、早稻田大学、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等多所著名院校讲学、授课、参加学术会议或合作研究。著有《祖宗之法——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、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》、《课绩·资格·考察——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》、《朗润学史丛稿》等多部著作。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80余篇。

2008年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、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。2007年主讲课程“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”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。2006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。著述曾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、论文一等奖。



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。丰厚的历史积淀，是我们灵魂的“根”，也是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的历史性选择的“魂”和“根”。无论我们的具体追求是什么，总是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天，要通过中国的历史去理解历史的中国。

中国古代帝制大致延续了两千年，宋代处于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中段。宋代前期的统治中心在北方的开封，因此被称为北宋；北宋灭亡后，统治中心南移至杭州，史称南宋。两宋加起来，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是320年左右的时间。当我们谈起这一段时期时，每每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一时期是创新与因循并存的时期，是社会经济、文化科技、制度建设都有突出成就，位居世界前列的时期；与此同时，也是受到周边民族政权的强烈挤压，面临严峻挑战，政策应对有诸多失误的时期。

## 一、对于宋代历史的基本认识

对于宋代的历史，很多国学大师都有过精辟的概括，

史学界通常也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，而宋代的这种“不同”是特别显著的。

严复《致熊纯如的信》：

古人好读前四史，亦以其文字耳。若研究人心、政俗之变，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。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，为善为恶姑不具论，而为宋人之所造就，什八九可断言也。

陈寅恪《邓广铭〈宋史职官志考正〉序》：

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。

钱穆《理学与艺术》：

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，最要在宋代。宋以前，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；宋以后，乃为后代中国。……就宋代而言之，政治经济、社会人生，较之前代莫不有变。

海外学者称这一时期为“早期近代（early modern）”，因而也对其十分关注。近些年来，欧美学者、日本学者都有许多著述。

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，宋代是一个注重稳定的时期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。宋代“祖宗之法”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“事为之防、曲为之制”，稳定至上是宋代政治的核心目标。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，宋廷立足于防微杜渐的措置确实有成功之处。其统治达到的纵深层面，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。

宋代的文化环境比较宽松，士人群体相对活跃，可以说是一个大师和精英辈出的时期，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。这种活力，学界从不同的角度，有许多阐述。英国的史学家 Mark Elvin 就说在中国“中古”的这段时期，发生

了“经济革命”。国内很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，比方从农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有所谓的“绿色革命”；从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的形成来看有“商业革命”；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，也就是“交子”的出现来看当时的“货币革命”；另外从城市形态、都市面貌的改变来看“城市革命”；从印刷术的出现，促进知识的传播来看这个时期的“信息革命”；当然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“科技革命”。李约瑟在他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开篇部分就说道：“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里边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的时候，往往你会发现它们的主焦点是在宋代，不管是在基础科学方面，还是在应用科学方面都是如此。”马克思曾经评论道：“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——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。”指南针应用于航海，为后来新航路的发现提供了技术上的前提。印刷术促进了中国及世界领域里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。火药发明之后，已经在宋代的武器装备中使用。后来火药武器通过阿拉伯人、蒙古人传到了欧洲，成为战争中重要的杀伤性武器。

宋代军事力量的不振，历来受到诟病。李华瑞教授曾经说：“纵观两宋与辽、西夏、金、元朝战争的重要战役，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，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，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、西夏、金、元朝进攻的防御战，则宋军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。”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专门从事军事史研究的曾瑞龙教授也曾经指出：宋代整个战略架构中最脆弱、最经不起考验的，就是从和平突然转取攻略这一个环节。这种军事上的被动情形，与宋太宗以来“守内虚外”、“强干弱枝”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。

总的来看，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，它面

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、新挑战，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；但它在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，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，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，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。

## 二、宋代的立国环境和政策导向

### （一）宋代立国的时间和空间

宋代并非处于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顺遂优越发展条件之下，可以说是“生于忧患，长于忧患”。就其自然条件而言，如竺可桢先生所说，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气候转寒，温暖期趋短。12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。我们知道，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，如果气候非常寒冷干旱，那么生存空间就会受到影响，于是可能南下，到中原地区争夺资源，导致与中原政权发生激烈冲突。宋代正处于“天时”相对严酷的这样一段时期。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，黄河经历了数百年的安澜时期。所谓安澜就是不泛滥，波澜不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西晋末年“五胡乱华”，北方少数民族进入黄河中游地区，他们基本上不从事农业生产，结果大片农田变成草原，水土流失相对而言并不严重。而隋唐以来，伴随黄土高原农业开发而来的水土流失，导致唐末至北宋时期水患严重，黄河河道呈扇面形大摆动。黄河水害给当时的国计民生和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。北方经千年开发，农业经济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多；而南方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，唐宋时期实现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，南方逐渐成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。经济重心南移，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的基础之上。唐代中期安史之乱

(755—763)后，北方动乱频仍，成为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关键因素。

唐朝疆域宽广，其统治中心在关中。为维护西部地区安全，唐朝派重兵驻扎西北，同时委任安禄山扼守东北。公元755年，安禄山起兵反叛，唐朝政府被迫收缩力量，放弃了西北大片疆域，东北亦不为中原王朝所控制。唐末五代，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割据局面。北宋所统一的，是原五代十国辖区（基本是汉族长期活动的农耕地区），但远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大一统”。周边民族政权环立。正是在这种情形下，“中国”有限“空间”的概念逐渐得到承认。

## （二）基本政策导向

帝制时期基本的政治特征是专制。相对而言，“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”（虞云国《细说宋朝》）。宋代是一个崇尚平稳、注重微调的时代。“立纪纲”与“召和气”，是赵宋统治政策与措置的关键两轴。“纪纲”（纲纪）其实就是法制、法规，就是制度，就是求得平稳的一轴；所谓“和气”，在宋人心目中，是一种交感于天地阴阳之间、自然运行的和谐雍睦之气。这两轴的交互作用，构成为当时的政治基调。

北宋初期，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种上下有别、尊卑有序的政治秩序。这一秩序的建立，伴随着太祖君臣把军政权、民政权、财政权收归中央的过程。在“先其大纲”的原则之下，步步为营，比较稳妥地解决了禁军的统帅权及中唐以来节度使尾大不掉的问题。

宋朝建国之初，以往曾经与太祖赵匡胤“比肩同气”的禁军统帅们，飞扬跋扈，非常骄纵。太祖深知政权更迭多由禁军统帅发动，于是在建隆二年（961）利用宴席之

际，动员禁军的高级统帅交出兵权，是即所谓“杯酒释兵权”。史籍中有这样的记载：

宋太祖：“人生如白驹之过隙，所为好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。尔曹何不释去兵权、出守大藩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。多置歌儿舞女，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。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，君臣之间两无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！”

明日，皆称疾请罢。上喜，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。庚午，以侍卫都指挥使、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，殿前副都点检、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，殿前都指挥使、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，侍卫都虞候、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，皆罢军职。

——《涑水记闻》卷一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

此事细节虽不一定确凿，但是禁军统帅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、张令铎等人都于同一天“称疾请罢”，幕后必然有所操作。这样的一种幕后操作，一方面是紧锣密鼓，另一方面又是波澜不惊。借利益交换的方式，和平转移大将兵权，在当时是代价较小的成功举措。相比于汉唐初期对于元勋功臣的处置甚至杀戮，宋初的做法显然比较理性。

所以很多学者认为，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。沈括曾经说：

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：“天下何物最大？”普熟思未答间，再问如前，普对曰：“道理最大。”上屡称善。

这个故事的真实性，现在已经无从核对，但它被反复

传颂，至少反映出宋人的认识。宋代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，据说宋太祖曾经立有誓约（见曹勋《松隐集》）：

艺祖有约，藏于太庙，誓不诛大臣、言官，违者不祥。故七祖相袭，未尝辄易。

“不杀士大夫”，“不罪言事者”，是赵宋“祖宗之法”中经常被征引的内容。

以宋代士大夫的际遇与此前的唐代、此后的明代比较，可以看出其间明显的不同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开元年间，“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，敕朝堂杖之”。官员会因执行公务不当而受到公开的杖责与羞辱。这样一种情况，到明代变得更加严重了。《明史·刑法志》有关于廷杖的记载说：

廷杖之刑，亦自太祖始。……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。……刑法益峻，虽大臣不免笞辱。……公卿之辱，前此未有。

当时的官员每天上朝都要与家人诀别，如果晚上顺利回来，就觉得多活了一天。因为在朝堂上，说不定冒犯了皇帝，就会被当众责打，也可能当即送命。而宋代则无此类现象发生。有个例子，说：

(宋神宗时) 陕西用兵失利，内批出令斩一漕臣。明日，宰相蔡确曰：“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，臣等不欲自陛下始。”上沉吟久之，曰：“可与刺面配远恶处。”门下侍郎章惇曰：“如此即不若杀之。”上曰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。”上声色俱厉曰：“快意事做不得一件！”惇曰：“如此快意事，不做得也好！”

——侯延庆《退斋笔录》

可见在宋代，士大夫相对受到礼遇，他们对国事发表

意见的空间，比此前的唐朝和此后的明朝都明显宽松。

### 三、士大夫政治和文官制度

#### (一) 科举制度和新型士人的成长

宋代的士人很多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到官僚体系里面的。科举制度历经若干朝代（605—1905），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年之久。经统计，在历朝历代里面，宋代的年均取士人数独占鳌头。宋代科举取消了以往对于举子的身份限制，“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、卓然不群者，亦许解送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）。

考试制度的严密，促成了相对公平与开放。一些出身清贫的“寒俊”得以脱颖而出，登上了宋代的政治舞台。

吕文穆公讳蒙正，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，与温仲舒读书。……后状元及第，位至宰相。温仲舒第三人及第，官至尚书。公在龙门时，一日行伊水上，见卖瓜者，意欲得之，无钱可买。其人偶遗一枚于地，公怅然取食之。后作相，买园洛城东南下，临伊水起亭，以“瓜”为名，不忘贫贱之义也。

——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八

范仲淹“断齑画粥”：

公生二岁而孤。少与刘某上长白僧舍修学，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齑数十茎，……入少盐，暖而啖之。如此者三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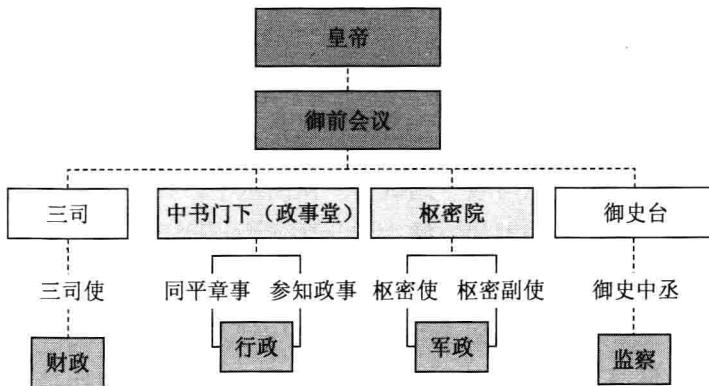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出身贫寒的新型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学术思潮丕然一变，自觉意识空前成熟。在他们心目中，“天下者，中国之天下，祖宗之天下，群臣、万姓、

三军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”（《宋史全文》）；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（张载语）成为一代优秀才俊集体性的抱负与追求。

## （二）权力制衡与信息沟通

宋代君主集权、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，与此同时，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强。这两种趋势构成一种张力。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：一、致力于建立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、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；二、为保证理想秩序的建立，必须“致其君为尧舜之君”。所以当时的君臣之间的关系，既有集权的一面，同时也有制衡的一面。

北宋前期中枢机构示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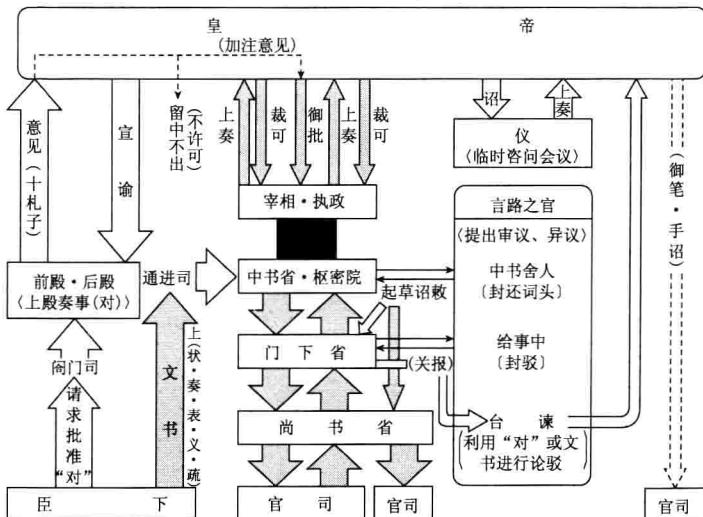


宋代实行“两府制”。所谓“两府（二府）”，一是负责行政民政事务的中书门下，一是负责军政事务的枢密院，两府的首长就是当时的宰相和执政，二者合在一起叫做“宰执”。两府之外，还有负责财政事务的三司、负责监察事务的御史台与谏院（二者合称“台谏”）。这些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，遇重大事件要与皇帝直接讨论，这种讨论决策的机制就称为“御前会议”。北宋前期的中央机

构，基本上不是层级很深的金字塔式结构，而是一种相对扁平的层级结构。

宋代政令文书流程图

(平田茂树制图)



文书是信息与政令的载体。从图示中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政令文书的流转方式。宋人有一说法，“事无巨细，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”（《宋朝诸臣奏议》），也就是说，皇帝的意愿，如果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讨论，可能不被视为“圣旨”，下面的执行部门有权提请复奏。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制约。在这一流程中，负责草拟文件的中书舍人，负责审核文件的给事中，负责监察的御史台、谏院，都有权在政令形成、颁出、施行的不同环节提出意见。

宋代在君主、宰执（宰相与执政官员）、台谏之间，形成制衡关系。如南宋宰相杜范所说：

凡废置予夺，（君主）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，

而后见之施行。如有未当，给舍得以缴驳，台谏得以论奏。是以天下为天下，不以一己为天下，虽万世不易可也。

——杜范《相位五事奏札》

台谏（御史台+谏院）的作用，尤其值得注意。在庙堂之上、殿陛之前，台谏官员可以与皇帝相可否、争是非。《宋史》指出“宋之立国，元气在台谏”，台谏官员独立言事原则得到全面确立。

谏官虽卑，与宰相等。天子曰“不可”，宰相曰“可”；天子曰“然”，宰相曰“不然”：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，宰相也。天子曰“是”，谏官曰“非”；天子曰“必行”，谏官曰“必不可行”：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，谏官也。宰相尊，行其道；谏官卑，行其言。言行，道亦行也。

——欧阳修《上范司谏书》

宋代君主以“防范壅蔽”为目标，“言路”相对畅通。如南宋魏了翁所说：

所谓宰辅宣召、侍从论思、经筵留身、翰苑夜对、二史直前、群臣召归、百官转对轮对、监司帅守见辞、三馆封章、小臣特引、臣民扣匦、太学生伏阙、外臣附驿、京局发马递铺，盖无一日而不可对，无一人而不可言。

——魏了翁《应诏言事》

臣僚奏对方式与途径众多：既有行政体制之内的轮对、转对；也有行政体制之外的经筵官员迩英留对及夜对等。

轮对、转对一方面是君主了解下情、了解信息的途径，另一方面也是考察官员的机会。“抱才气者皆以得见